

联合国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十一次全体会议
1993年11月23日,星期二
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嗣后: 马蒂尼·埃雷拉先生(副主席)
(危地马拉)

上午10时30分开会

议程项目33

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A/48/264和Add.1、Add.2和Add.2/
Corr.1、Add.3和Add.4)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
我谨提议,关于这一项目辩论的发言名单今天中午截止
登记。如果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因此,我请希望参加辩论的代
表尽早在名单上登记。

沙希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
言): 由于旧的世界秩序已经结束,对这一旧秩序的管理
也应当结束。如果真正存在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它就
需要有新的管理方法。目前的安全理事会已经不再反
映国际局势的新现实。相反,它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时的国际局势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冷战结束的几十年中所形成的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联合国本身已经变了。其成员数目是创建时的四
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本届会议开始时的一般性辩论中
许多发言者谈到需要审查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以使安理
会能够发挥符合《联合国宪章》授权的决定性作用。
只有通过公平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并全面审查安
理会的程序和决策进程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外长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指出:

“在这方面,联合国是我们可以找到的促进
国际对话与合作的最好框架。为了使此类对话产
生有利于各方利益的积极成果,有必要进行民主
改革,调整本组织的决策进程,以反映大多数国家
的观点。例如,在各会员国自己没有机会对联合国
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在其各主要机构中确保
公平代表权并在解决对会员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问
题时防止采用有选择性和双重标准之前,让联合
国机制有时受操纵,以便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干
涉各国内部事务是不合理的。”(大会第四十八
届会议正式文件,全体会议,第14次会议,中文本
第17页)

安全理事会席位的增加将提高其效率并使其能够
更好地履行《宪章》规定的主要责任,即维护国际和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
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记录表决和/或唱名表决结果后如有星号请参阅本记录的附件。

Distr. GENERAL

A/48/PV.61
6 December 1993

CHINESE

平与安全。这也将是安理会能够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对重大问题进行更民主和更重要的讨论,并将确保安理会通过的决议真正表达国际社会的意愿,从而加强其行动的合法性并鼓励遵守其决议。

安全理事会过去几十年中的工作总的说来受到了其常任理事国的行动的阻碍,毫无疑问,公平地增加安全理事会的席位决不会阻碍其工作或降低其效率。相反,这样一种公平的增加将加强安全理事会的能力,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本组织会员国关心的问题,目前有184个会员国,其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愿意并能够通过参加维持和平和联合国的其他活动参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会员国应当能够成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样做的方法是,为每一个发展中区域增加一个常任理事国。例如,可以让阿拉伯集团在安全理事会获得一个拥有所有有关权力的永久席位。这个席位可以轮流担任,其方式将在阿拉伯集团内部决定。让阿拉伯集团获得一个永久席位将必然使阿拉伯国家能够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有效贡献。

目前的安全理事会继续是联合国最不具民主代表性的机构之一。这是由于安全理事会中不平衡的地理代表性以及常任理事国行使的否决权所造成的,而否决权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现象。否决权也是不民主的,违背了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不结盟运动不断强调需要使国际关系民主化,换句话说,要确保更多的参与决策进程。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考虑改组安全理事会,而这一次的改组不应当只限于简单地增加席位,而应包括对安理会的程序和决策进程作全面的审查。

规定有否决权是出于对不再存在的现实和局势的考虑。一些代表团认为,否决权现在已不存在,因为尽

管发生了无数国际危机,最近实际上未使用过否决权。然而,最近未使用否决权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否决权不再会被使用。因此,如有可能,我们必须取消否决权,或者至少限制其使用,尤其因为自从安理会建立以来否决权被用来强加反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利益的解决方法。这证明是阻碍了安全理事会发挥其首要作用,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某些常任理事国扩大安理会的任务和活动范围的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超越了《宪章》的规定,在其他情况下则侵犯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职权。在一些情况下,这使人们对安理会措施的合法性产生疑问。而且,联合国有些成员感到,通常,安理会在处理涉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直接利益的问题时倾向于积极采取行动。为此,我们必须强调,安理会的作用必须同《宪章》所规定的安理会授权相符合,这样,大会及其各附属机构的授权和权威就不会受到侵犯。

安理会自从将近半个世纪前设立以来,其程序和其他机构的关系几乎一尘不变。即使在今天,安全理事会仍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行事;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通过永久性议事规则的时候了。目前,安理会的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些常任理事国力图以各种方式支配安理会的活动;并取决于不公开的非正式磋商,这种磋商已经成了一种日常的做法,几乎成了仪式。

这些磋商使安全理事会非理事国没有机会参加决议通过前的讨论。同样,通知安理会会议的方式,也使非理事国难以旁听各种会议,特别是那些在非正式磋商后召开的会议。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安理会最近才象大会那样,采取在《日刊》上预告安理会会议议程的做法。

这些事实表明,安理会的工作在透明度方面有所

缺陷。鉴于对安理会活动的媒介报道在向世界公众舆论解释联合国工作方面极其重要,我们认为,应该任命一位安全理事会发言人,为这种报道提供便利。提高透明度肯定能加强安理会的信誉。

安理会还应该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处理同大会的关系;大会对安理会的作用,一直并继续限于收到一份关于安理会工作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份报告应该更加详细,做更多的分析,使联合国会员国能够真正了解以它们的名义采取的各种行动。

改变本身并非目的。它是确保安理会适应一个变化中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协商一致通过的第47/62号决议,清楚地反映了在安理会中进行必要改革这一需要。

目前的国际局势、联合国成员数目的增加,需要确保尊重平等和主权、民主及决策透明化等原则:所有这些考虑决定了必须审查安理会目前的组成,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安理会目前的组成已不再反映国际现实。必须让安理会能够在一个大谈相互依存的世界的新的国际气候中发挥其作用,在这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参与决策是所有国家的一项根本权利。

索马维亚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今天大会开始审议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问题对联合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讨论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的实际方面,而且要阐述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在冷战后世界中应该和不应该发挥的作用的看法:这个问题的两方面都至关重要。

人们已在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看到这一问题极其重要,几乎所有的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都在一般性辩论中提到这一问题。

人们已在大会堂里多次指出,国际舞台上目前的变

化,在其深度、内容及迅速方面,都是不寻常的。这当然是事实,而且联合国不能无视这些变化。适应国际社会目前的需要,使改革成了一项必须履行的职责。

安全理事会在结构上静止不变,而安理会的决定却过份活跃,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格式。

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涉及广泛、牢固的政治协定,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在这种共识中,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智利欢迎并充分赞同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所表达的意见,即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编制问题极为重要,我盼望在本组织五十周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A/48/1,第40段)

我国政府认为,在改组安理会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特别集中加强安理会工作的效率、代表性与合法性。

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安全理事会中的改变必须反映当今的国际现实,使新的世界强国成为安理会的成员。使这些国家加入安理会必定会表明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艰巨任务的真正和坚决的承诺。

因此,重要的是,根据《宪章》第24条代表本组织全体会员国采取行动的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和组成应充分反映本组织会员国的增加及其在区域、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多样性。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增加应确保更好、更适当地代表全体会员国,但不应影响其效力,在必要时应加速联合国系统这一至关重要机构的决策进程。

关于否决权问题,智利原则上认为否决不是一个民主机制。然而,我们认为,否决权的改革暂时还不可行。我们认识到,在国际关系这一新阶段占上风的得到改进的合作和政治协商一致气氛推动了安理会的工作,其中的一个非常积极的结果是有限使用否决权。

基于这一经验,我们或许可以探讨一种今后可以控制使用否决权的模式。例如,我认为有可能让在安全理事会享有否决权的五大国以一种非常民主的姿态自愿的保证在作出本组织的一项关键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决定,即选举联合国秘书长时放弃使用否决权。这将是五大国的一个非常民主的姿态。

秘书长的报告(A/48/264和Add.1-4)中载有75个会员国就这一问题提交的意见。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尽快改革安全理事会目前结构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已有了明确的协商一致意见。

鉴于上述情况并为实现既定目标,智利提出了在对安全理事会实行的任何形式的改革中都应考虑的下列具体建议。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不应超过25个,可分为四类: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长期任职的区域性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

第一类,即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可以是今天在安理会享有这一权利的国家。

第二类,可以是两个没有否决权的新的常任理事国。这一类可以包括目前具有经济和政治潜力、真正有能力对安理会的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我指的是日本和德国。

第三类是长期任职的区域性理事国。这些可以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鉴于其特定的重要性,它们可以定期地作为其区域和次区域代表经常性地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它们也没有否决权。这些长期任职的区域性代表的任期可以长于非常任理事国,并有资格连任。因此,一个国家在安理会任期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每个地区的意愿。根据这一实验的结果,各区域集团可以决定要求让集团中的一些成员担任没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推选这一类理事国的方法当然需要进行深入、详

尽的研究,而且我们准备考虑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可能提出的建议。

最后一类,即非常任理事国可以是按目前推选非常任理事国的方法选出的理事国。换言之,可以有公平的地域分配,这类理事国任期两年,不能连任。

所有这一切使得有可能更好地满足和调和各国和各区域的愿望,同时又能确保安全理事会成员构成、审议和决策进程的平衡。

我们认为,任何改革进程如果不包括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的话都是不完整的。这两个因素是安全理事会决策透明度的必要性和将有关其工作的信息提供给该系统中的其他机构,尤其是大会的必要性。一段时间以来,不同类型的会员国不论在向秘书长提交的意见中还是在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一再表达了这一观点。令我们高兴的是,安全理事会在过去几个月中已考虑并实施了其中一些建议。我们尤其要强调的是巴西大使,罗内尔多·莫塔·萨登贝格先生阁下所作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他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亲自向大会提交了今年安理会的报告(A/48/2)。仍有很多工作要做,然而,这是讨论一些可以采取的可行措施的很好机会。

当今这一大国间增进合作的时代使安全理事会能够紧张地工作,通过比以前多得多的决议和主席声明,以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外,更加频繁地作出决定在世界各地开展维持和平行动,这意味着今天成千上万的男女,正在作为这些行动的一部分作出宝贵的贡献。

我们对振兴联合国的这一机构表示欢迎,同时在分析今后要走的道路以及本组织为有效地实施其决议在政治、物资和组织上具有的真正手段时必须谨慎行事。最能削弱联合国的莫过于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力确

保其自己的决定得到实施。我们必须更为仔细地研究所追求的值得称赞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所具有的真正手段之间的关系。

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过去的无所作为和现在的积极行动之间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以便使其能负责地进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工作。我们知道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危机的受害者希望联合国能够为它们做些事情。我们知道在安全理事会作出每一项决定后有一些国家合理地感觉到采取行动,并且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是很重要的。当然,最近取得的许多成功值得我们称道和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本组织还没有充分准备也开展这项工作。它正在沿着一条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爆炸已够多得了,足以使我们了解到整个联合国,而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的形象和信誉正在受到消极影响。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宪章》的序言,我们的结论必然是联合国的命运不能是成为冷战后世界的宪兵。遗憾的是,这正好是最近它给人的形象。

如果要明确地确定安全理事会今后的任务,我们必须理解,安全的概念需要扩大。

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是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世界不同区域的社会紧张状况。我们用“社会炸弹”的现实取代了核弹的危险。

今天,最大、最严重和最广泛的不安全就是个人的不安全,并且是由于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而造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不安全称为贫困、失业、家庭、街道和政治暴力、社会解体以及广泛的被排挤、排斥和歧视的感觉。如果我们真正希望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首先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预防性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常常是安全理事会稍后必须处理的公开冲突的直接原因。

联合国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帮助加强我们所有社会的人的安全。联合国必须能够在政治上优先重视地位低下者和被剥夺者的生活。

如果我们这样看待事情,显然除了某些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外,安全理事会没有解决社会紧张状况引起的重大问题的手段。社会和经济问题不能用军队、制裁和强制性措施来解决。它们只能用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知识和想象力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改善来解决。

对我们所有社会来说,发展是解决不安全的主要方法。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预防性外交。这个观点从智力上讲不难理解,但却有着意义十分重大的实际影响。它意味着这些安全问题无法由安全理事会处理,因为它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授权和手段。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地属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专门机构和规划署以及国际金融和贸易机构的处理范围。

因此,我们认为,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措施的做法,在许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可以根据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的规定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用得过多。此外,这些行动的很高代价严重影响了联合国拥有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它还危及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合作的计划与方案的执行,而这些是联合国的指导原则之一。

智利准备积极促进寻求达成最广泛和牢固的政治协商一致意见,以成功地结束对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项目的审议。我们现在正在这样做。显然这应该适当考虑到各会员国和构成联合国的各区域集团的利益。

最后,我所说的任何话丝毫不减少智利对安全理事会中心作用的支持。我们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我们

要求提高效率；我们要求更加谨慎。但是，我们也要求继续参加我们认为适当的，总的来讲目的在于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责任的和平行动。

周先生(新加坡)(以英语发言)：我国外长黄根成先生10月6日在大会发表讲话时，以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方式分析了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的目标。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的非正式讨论中。该决议草案建设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审议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所有方面和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该工作组审议安理会改革工作的狭小与广泛的授权范围的问题。展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预见，所有问题，包括挑选任何新成员的基础或标准的问题，需要于1994年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举行的讨论得到充分处理。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我们对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处理办法是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的，即这项工作是为了全体会员国的普遍利益。这是一个公正和平衡的办法。它意味着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应该以某种程度的宽阔胸怀、让步精神和努力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意愿来参与这个问题的处理。虽然每个会员国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利益，但这个办法需要包括理解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的更广泛的利益。严格、不让步地坚持只讨论某些问题而不讨论其他问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瘫痪停顿状况。因此，我们希望采取能够使有关安全理事会的所有问题都得到审议的方针。我们认为，所进行的讨论必须审查增加成员数目和有关安全理事会的其他问题，例如安全理事会高效率的有效运作及其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关系。

我国代表团从三个角度来看待安理会的改革工作。首先，我们要谈谈需要全球领导，以处理联合国在

不远的将来面临的各种问题。毫无疑问，联合国在冷战后世界里，应当继续提供必要的全球领导。毕竟联合国依然是唯一的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有效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能力又必须来自一个强有力和高效率的安全理事会。而其核心仍然是常任理事国。

那么在今后几十年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必须是什么呢？我们的看法是，想要享有常任理事国地位的特权，就必须承担全球领导的长期责任和这一任务带来的财务和物质方面的负担。特权和责任是并行的。

在1945年举行的旧金山会议上，墨西哥建议应当明确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区别。墨西哥指出，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地位应仅以把更广泛的权利给予担负最繁重义务的国家这条法律原则为基础。墨西哥建议，应该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条件上加上“这些国家应该对维持和平担负最大责任”这句话。但是，这项值得赞扬的建议却没有得到实施，尽管实际上五个常任理事国总的来讲接受了这项增加的责任。

这个例子表明常任理事国的问题在1945年是多么困难，以及在大约50年后仍然是多么困难。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特别是其常任理事国的责任将需要根据新的国际局势予以认真检查和阐明。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种设想：鉴于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其常任理事国应满足某些条件、履行某些责任并承担更沉重的义务。只有那些同意接受这种义务以使联合国在冷战后时期更加有效的国家才应考虑给予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

我国外长在向大会所作的发言中已经阐述了给常任理事国的一些标准。我不再此重复。常任理事国的

一些额外的标准为：第一，一个常任理事国应具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行事的长期传统，特别是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避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威胁或使用武力。

第二，一个常任理事国必须具备在危机情况下使军事及平民和物质资源听任联合国使用的意愿和能力。

第三，一个常任理事国应具有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良好记录。它还应通过为本组织活动的其它方面作出实质贡献、包括加强和支持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实质性援助而表明自己是联合国的一个负责与建设性的成员。

最后，但却是同样重要的是，应当只有在得到联合国全体成员支持或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选择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这是为了区别这种选举与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后者仅需要三分之二多数。

无论根据何种定义，小国都构成联合国会员国的大多数。因此，必须从小国家的角度看待安理会改革的问题。小国易受到对其政治和社会经济福祉的威胁并对这种威胁很敏感。因此，小国在确保有一个富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有效和有所反应的安全理事会方面，具有一种固有的兴趣。第二，小国应确保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手段——即联合国维持和平、缔造和平和预防性外交——有成效和有效率地发挥作用，并得到良好的安排。否则这些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负担，而当在向对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真正需要它们的时候，国际社会其时可能不具备遏制这种侵略的意愿或资源。

总之，安全理事会必须有成效和有效率地运作。我们强调，这一点与仅仅成员国数目和代表性相比，更应成为安全理事会改革行为的主要指导原则。

我们的第三种观点，就是要问联合国今后将面对何

种问题。一些问题已经开始出现，这些就是发展不足，人口过剩、疾病、环境恶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以及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的问题。它们都可以归类于一个如何使生活在拥挤的地球上的80-100亿人民能够进行合作并实行《联合国宪章》的序言中所简洁有力地阐述的共同意图的总的问题。

联合国将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小国家必须向它在相互竞争的要求之间作出公正裁决并求助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键的国际机构。大会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联合国机构，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一道将需要发展和加强有效处理这些跨国家问题的能力。得到加强的大会将需要与一个更有效的安全理事会密切合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改革不应狭隘地集中于扩大规模的问题，而是还需要检查安理会与广大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了激发广大成员的更大信任并因此确保得到更大的支持，安理会还将需要在其工作方法方面更具透明度和更具协商性。

主席先生，我们完全相信，你将以你已经证明的外交能力并以各成员国之间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合作精神，成功地指导我们完成将在不限名额的工作小组中进行的艰难谈判。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行动结束时坦率地指出：联合国系统本身已开始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为了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的总体利益而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地说，这一行动是有价值的。

卡尔佩奇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大会1992年12月11日的第47/62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请各会员国提交有关对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问题可能进行的审查的书面看法。他们的观点现载于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A/48/264和Add.1、Add.2和Add.2/Corr.1、Add.3和

Add. 4。

对于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数目需要增加一事已取得明显一致看法。对这一点基本上有三种强有力的论据。第一,联合国的会员国已从安全理事会目前组成开始生效的1965年的113个国家,增加到1993年的184个国家。第二,全体成员认为积极的正在演变的国际局势中存在一种适当的看法,即平等参与、更平衡地代表权和政治平衡是促进《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关键。第三,联合国正通过安全理事会,不仅更深入地发挥其传统职能,而且还进入了根本上属于新型的活动领域,这些领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到各个国家。

如果问题仅仅是扩大安理会的规模,那么就可以根据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而制定一种适当的数学公式。斯里兰卡赞成把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扩大到21至25之间。

确定新席位公平分配的准绳将更为复杂。所谓按地域分配席位涉及的问题大大超过地理上的问题。如果按联合国所采用的传统地区分类,有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西欧和其他国家、以及东欧五个地区。然而,在安全理事会地区标准的运用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具有严重的政治偏向。安理会受到战后期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层的影响。在数量上和其他方面,这种倾向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会员国不公平,它们的代表名额不足。如果要在地区基础上增加,斯里兰卡认为应该严格进行,准确地反映每个地区所占比例的力量。

除了安理会成员名额增加的问题以外,我们面前的项目也责成我们考虑一种将是公平的代表名额。这一想法大大超越了对于拟议中的席位增加的纯粹是数学上的分配。

这个问题涉及更大的问题,诸如常任理事国的概

念。它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仅由各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是否符合对公平的期望以及《宪章》所规定的所有各国享有主权平等的原则。去年在雅加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首脑认为,保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专有和支配作用的否决权同使联合国民主化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重新审查。过去的经验表明行使否决权有时破坏了安理会采取果断行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最近并没有象过去那样运用否决。

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目前的地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重要的是不要避免仔细审视常任理事国中的机制,因为在某些意义上,它是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的中心。出现了新的现实——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以及自从五个常任理事国被授予特殊地位以后所出现的其他因素。

正在具体提出、讨论并主张其他一些国家现在也具备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条件。所提出支持这些国家的一些论点至少同在确定目前的常任理事国的时候被认为是有效的论点同样具有说服力。如果我们真正关心重振联合国和增加安全理事会的信誉、道德权威、有效性和代表性,我们就不应事先假定常任理事国的目前情况是永远不变的。应当将想法集中于是否应该考虑增设任何享有常任理事国地位的国家。

考虑到《宪章》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的专门职责,必须在进行最认真的思考后才能对其目前的组成、大小和职责进行任何变动。应当避免为变动而变动。只有在改善目前情况的替代办法被人们接受的情况下才应实行变动。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我们欢迎正在形成的协商一致意见以设立一个不限名额的工作小组,它将考虑安全理事会的大小、组成和新成员的基础以及其他有关事

项。工作小组应在公开和透明的条件下进行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审议。

一直持续的基本前提是,不论安全理事会的大小、组成和权力如何,人们期望它以一个议会或其他全国代表性机制从其人民那里得到授权的方式代表各会员国行事。如果它不能代表期望它所代表的那些人行事,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信誉并从而最终失去其有效性。

工作小组的业务授权所涉及的大大超过单纯的程序。斯里兰卡认为,审议安全理事会代表性的进程概括地说,应该是:第一,提供机会让所有国家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参加,第二,审议有关安全理事会成员问题的所有方面,而不要将审查局限于进行调整,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桌旁多增加几个席位,第三,经过协商一致作出决定以使它们被普遍接受。

这将确保整个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并且反过来又对安全理事会的行动给予更大的力量和效果。毕竟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75个代表团对作为大会第47/62号决议的结果的秘书长的要求作出了答复,马来西亚是其中之一。在我们使联合国成为全球行动的真正工具努力中,这个议程项目是国际社会面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所有各级正在广泛寻求新的平衡和结构以便对付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环境。联合国本身必须成为变革的一部分,处理关键的全球性问题并协调各国的行动以实现《宪章》所规定的共同目标。

联合国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中的改革和重建正在取得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此外,旨在振兴和重建大会的工作的正在进行。在所有这些变革的背景下,不可否认的是,安全理事会也必须进行变革和适应。安理

会的改革是必要的,不仅是为了反映更公平的按地理分配的代表性,而且也是有利于增加政府间多边进程中的民主化进程。

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这个问题是13年前第一次提出的。它在去年成为一次富有成果的辩论的主题,导致通过第47/62号决议。今年辩论继续进行,问题的范围也扩大了,因为这个问题应当从单纯的代表性和增加成员转向包括所有其他方面。从本质上来说,正在出现一个进程,或者说一个曲折和复杂的进程,以实现安理会的集体变化与改革。

马来西亚的全面立场反映在1993年7月20日的文件A/48/264中。我不准备在这里叙述细节,但我要重申突出的几点。第一,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应当是全面的。第二,安理会的决策过程必须有透明度。第三,安理会应当向全体会员国负有更多的说明义务。第四,安理会应当更好地体现公平的地理代表性。

人们会注意到,我们的方针是全面的。我们认为,安理会的种种严重问题和缺陷不可能一下子求得解决。这里涉及重要的原则,必须按照新的现实来审查这些原则。如果认为,例如,增加两个常任理事国就可以切实改进安理会,将是错误的。拘泥于接纳两个理事国只会曲解必须处理的各种重大问题:工作负担的加重、期望值的提高、值得怀疑的工作方法、适当代表性的不足以及职责和目标的含混。

在关于议程项目11,“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辩论期间,我国代表团论述了其中一些问题。对于五个常任理事国垄断了安理会的大部分实质性工作,将“常任五国”变为某种排他性的俱乐部,我们表示了关注。我们强调指出,我们耽心联合国及其安全的概念正在因为适用双重标准以满足某些会员国的政治利益或私利而受到破坏。我们提到,迟迟不能采取断然措施,结

東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公然侵略,就是安理会有所选择和在各种必要情况下不能采取行动的一个明显例子。

我们坚持认为,安理会不愿强制实施其决议并尊重大会关于要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停止敌对行动和尊重人道主义法的第46/242和47/121号决议,必将损害安全理事会和集体安全概念的信誉。我们曾指出,安理会否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按照《宪章》第五十一条拥有集体或单独自卫的固有权利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必须立即进行改革,以打消人们的下述想法,即由西方主宰的安理会不断作出一些可疑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主要是由其他会员国、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会员国来执行。这类想法是源于安理会批准的维持和平行动,大国提出种种理由逐渐脱离这种行动。索马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后可能会出现某种局势,在这种局势中,第三世界国家的部队实际上将成为留在那里的唯一部队。

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在履行其责任时,必须按照《宪章》、尤其是其中第24条的规定采取行动。在这一方面,在采取重大决定或行动之前,安理会有义务同区域集团、部队派遣国和全体会员国磋商。安理会的决议应当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而不是为了满足常任理事国及其盟国的利益。正如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协议必须得到安理会其他成员更进一步的支持,并得到会员国更全面的支持,这样,安理会的决定才能有效而持久。

安理会应当努力使我们相信,它将奉行下列原则,从而争取全体会员国的信任和信心:它将不会成为强国向弱国强加其意志的工具;它将避免在国际危机中采取

选择性和歧视性作法;它将尊重公开和民主原则,并将对全体会员国的意见有所反应;它将不会超越《宪章》赋予它的权限。

同样重要的是,安理会成员国应当铭记,它们在安理会中的作用超越了其国家利益。常任理事国因《宪章》赋予它们的特权,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它们不应唯国家利益是从,或受国家利益的限制。

至于非常任理事国,它们对更多的支持者,也即它们所属的区域集团和其他选举它们的国家负有更大的义务。它们应当抵制而不是屈从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压力。马来西亚将支持作出努力,确保那些取得安理会成员资格的国家在各个方面有能力肩负在这一机构中的重要责任。

按照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马来西亚反对增加更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对新的会员国分类也持谨慎态度。进一步的分层只能加深和强化安理会现有的不对称。

否决权保证了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配地位,应当重新加以审议。我们认为,否决权现在已经是站不住脚的,不合时宜的。即使我们需要出于安理会中的不对称而接受某种加权我们也不能接受安理会中一个、二个或三个理事国要比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权力更大的局面。

时间到了今天,人们应当集体拒绝由一个精英集团继续在影响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上作出决定的概念。“和平纲领”中所载的今后的方案,无法由一个既不能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信任,又不能公平代表全体会员国的安理会来承担。大会与安全理事会之间必须更密切地相互作用。具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的重大决定需要经由全体会员国深入磋商之后作出。振兴的联合国必须造成一个活跃的大会,而大会对安理会所面临

问题的看法必须受到安理会的重视。

马来西亚承认,维持和平行动数目的增加给五个常任理事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并不反对审议如何来更公平地分担责任。联合国在采取必要步骤和措施改革安理会时,可以讨论这些和其他有关考虑。

主席先生,鉴于绝大多数会员国希望改革安理会,我们欢迎你通过磋商来推动这一进程。我们注意到一些代表团,尤其是印度和新加坡代表团为在这一方面帮助你而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自己也在同各个代表团进行磋商。在这一方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根本问题包括机制和职责问题。

关于机制这一具体问题,我们赞成目前出现的一种共识,即设立一个不限成员的休会期间工作组来处理改革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该工作组可在联合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马来西亚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关于设立两主席的决定,其中之一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津巴布韦。

我们全力支持不结盟运动关于赋予该工作组广泛职责的决定。其职责具体可包括:成员的增加,包括成员的数目和标准;安理会的有效和公开运作;全体会员国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关系。

该工作组应当努力求得协商一致,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可象有些人那样坚持对此作出清楚说明,因为这与其它主要委员会的作法不符。我想到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没有他们的同意,对安全理事会不能作出任何修正。

我们同意,这个工作小组应当试图在联合国五十周年之前完成其工作。马来西亚期待着同所有代表团一起努力,以保障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功。

由可靠性、民主和透明度为指导的,经过结构和实

质改革的安理会将为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作出贡献,使联合国成为实现和平、民主和发展的国际手段。如果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就有独特的机会朝着那个方向迈进。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一次黄金机会,使联合国陷入永远不能充分发挥《宪章》设想的潜力的境地。

萨姆汉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在过去的几年中可以见到无论是国际还是区域都对联合国的作用相当重视,尤其是对直接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机构—安全理事会作用的重视。伴随这种日益加强的重视的是为了重新审议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的职能与结构而进行的不懈努力。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确保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继续起至关重要、决定性和有效的作用,并导致世界问题、冲突和争端各个方面的根本解决。

联合国秘书长为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缔造与建造和平而提出的“和平纲领”反映了处理当今现实的紧迫需求。这要求按照《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并使之有效。因此大会审议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议程项目33是十分重要的。

安全理事会的结构尚未受到国家关系的变化和新的国际政治平衡的影响。自1963年以来,其理事国数目一直没有变化。毫无疑问,由于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增加,需要考虑对安全理事会的改组、以必要地增加安理会理事国数量来保证安理会的公平代表性的方面采取有效和现实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支持有限地增加安理会理事国数量不会影响其效力或对它有所限制的观点。相反,还会加强安理会对威胁、挑衅和违反和平与国际安全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

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强调对安理会的改组全面交换意见和建议的重要性。这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不限成员的工作小组来实现,小组的成员组成应当对本组织全体会员国开放。在这方面,应当考虑到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根本深远变化和本组织会员国数量的增加。

至于改组安全理事会的问题,鉴于在国际和区域水平上冲突和争端数量的增加,我们必须力图调和下列目标:首先在代表性方面,必须以保证国际社会各部分代表性的方式确立区域和各国愿望之间的平衡,在安理会的职能中保证民主化并加强透明度。在这方面,必须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因为这是建立这个国际组织所依据的《宪章》的基本原则。

其次,由于安理会需要对所有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就必须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效率。

第三,各国必须根据《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准则遵守以和平手段和对话来解决他们的争端的原则。

第四,鉴于本国际组织会员国数量的增加,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协调。

第五,《宪章》在第二十四条第一段中指出,安全理事会在履行职能的时候是代表了全体会员国。因此安理会必须更具代表性。然而这种数量的增加不应当对安理会的效率及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能产生副作用。

鉴于区域和国际水平上发生的根本变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新的政治现实。为了使我们能实现这些目标,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各地区在安理会中的适当代表性问题。我们强调确保安理会要有阿拉伯常任代表的重要性,因为自从联合国刚一成立以来,中东就一直笼罩在战争和冲突的阴影下;同时这也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

全,影响中东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我们希望,我们的审议能产生积极和决定性的结果,使安全理事会得以扩大和更有效力。我们希望这可以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1995年得到执行。

最后,我表示我们为安全理事会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感谢安理会的全体理事国。我们真诚地希望,这些国家,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能在调整安理会的职能与行动,使之适应我们新世界现实的工作中起积极的作用。本国际组织的全体会员国,无论大小,都必须尊重安理会的决议,以便建立共处、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建立一个更公正、公平并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

李肇星先生(中国):自1945年创始者们在旧金山签署庄严的《联合国宪章》并创建联合国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已经走过48年的风雨历程。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实现宪章宗旨和原则所确定的目标,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联合国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和挫折。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昨天的世界,联合国自身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会员已由成立之初的51个增加到现在的184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更好地履行宪章所赋予的职责,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贡献,是摆在所有会员国面前的一个共同课题。

中国代表团欢迎并重视联大审议“安理会席位公

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中国政府已经根据联大47/62号决议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愿意在此与各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

扩大安理会组成,是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合理要求,也是国际形势发展和联合国自身变化的需要。中国代表团赞成在适当的时候适当扩大安理会组成,使其更加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更好地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更能积极、均衡、公正、有效地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为了这一目的,扩大安理会组成应该充分顾及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尤其应该注意到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是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

除了扩大安理会组成问题,目前各国关心的还有增加安理会工作透明度,提高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对其决策的认同等问题。

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安理会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责任代表各会员国行事。安理会的行动应该是联合国会员国集体意志和共同愿望的体现,安理会应该对所有会员国负责。因此,采取适当措施增加安理会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安理会与广大会员国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代表团赞成安理会在此方面继续作出努力,从长远看,这样做将增强安理会的效力及其决策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扩大安理会组成并采取其它有关步骤,增加安理会的代表性,进一步提高其工作效率,使其更好地根据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履行宪章所赋予的职责,是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共同愿望。在这方面,中国代表团赞成许多国家的意见,即任何改革措施均不应影响和削弱安理会的效能,作用及现行有效机构。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安理会的扩大及如何扩大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涉及会员国的切身利益。只有在广泛、充分听取广大会员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意见

后,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寻求能为各方接受的方案,才能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赞成设立由全体会员国参加的工作组讨论扩大安理会组成及有关问题。

联合国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代表团真诚希望,在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下,联合国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健全、有效和令人信赖的国际组织。

海斯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本阶段一般性辩论中就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议题作了发言,正象其前任以外交部长身份在第四十七届大会所作的一样。我国代表团于今年3月5日还在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的特别委员会就这一议题作了发言。我在今天的发言中不准备对这些发言的实质性内容作重大补充;我要将我们的看法更集中于在一个具有恰当授权的工作组范围内进行谈判方面;这种谈判在当时预见到,而我们现在即将展开。

我首先想提及《宪章》第24和第25条。在第24条第1段中,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并同意安全理事会在履行此项责任时,是代表各会员国行事。在第25条中,各会员国同意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

这些条款标志着创始会员国前所未有的自愿权力移交,包括爱尔兰在内的后来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其它国家认可了这一权力移交。我们认为,包括创始国和后来加入的国家在内的全体会员国的这种权力移交主要出于下列三种假设:其一,认识到只有一个具有有限规模的机构能实现必要的效率和即时性;其二,对其组成足以能够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感到满意;以及其三,在前两项假定兑现时,对其行动将反映各会员国

的意志具有信心。我们认为,从本质上讲,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地来自《宪章》第24和25条的权威最终取决于各会员国对其合法性的认识,而另一方面,这一合法性是以上述三个假定为基础。

以下的说法已经变成了老生常谈,当然,与此相应,它也是真实的:特别是在近年来,地源政治世界已经彻底改观,因此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发挥《宪章》起草者起初为之设想的作用。安理会还面临着大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多种多样的威胁。考虑是否应该改革安全理事会和应该如何进行这种改革的运动一直在获得势头,在过去两年中尤其如此,在这个运动背后所抱有的关注是,保证使安理会有能力有效地处理它现在所面临的,而且不幸的是,很可能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仍继续面临的那种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具体的主要关注必须是采取行动,以便保证使安理会的权威最终所依赖的对其合法性的认识不致受到侵蚀。

因此,我国代表团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将顾及某些考虑因素。必须调整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以便考虑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大大增加,--这些会员国现在几乎已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并考虑到1945年以来政治和经济力量中心的变化。看来如果不增加某些席位,就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点,而增加席位将引起更多的困难问题,包括重要的程序问题。

此外,必须维护安全理事会有效和迅速地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个必要性对安理会的席位数目及其程序都具有影响。安全理事会一定不能仅仅象所要求的那样按照《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进行工作。它还必须被大家看到进行这种工作。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能够始终如一地实现透明。我国代表团意识到尽管这些考虑因素听起来相对明确和简单,但把它们应用于将出现的具体问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副主席马丁尼·埃雷拉先生(危地马拉)主持会议。

我国代表团在我们即将开始的谈判过程中的一贯目标,将是保证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之间有一种使它们将不断地在一起有一种共同目的感的关系。我们的立场将首先针对这个目标。我们打算在谈判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我们的谈判如果能够及时地在50周年之际达成协议,那更将是我们所有各国的一项巨大成就,并大大地提高联合国的公众形象。

巴特勒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辩论。这是联合国正处于过渡时期这个事实所带来的结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世界”,但它尚未成为“秩序”。自从冷战于4年前结束以来,联合国已经开展的新的维持和平、缔造和平、执行和平和建立和平行动比它于在此之前的整整43年中所开始的还要多。我们正在进行过渡,摆脱在那些年中使我们冻结的制度,我们必须规划出我们的目的地。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格雷思·埃文斯参议员在其于9月27日分发给大会的题为《为和平进行合作》的一书中论述道,需要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进行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决心用“合作安全”的概念来取代过去的“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概念。我们只有开展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行动,才将能够从我们的过渡,即我们除旧布新的过程中生存下来,并安全地抵达目的地。经过重新设计的安全理事会是除旧布新的必要变革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今天的发言将提出澳大利亚关于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进行这种变革的观点。在声明我们的观点时,我想在一开始便明确这一点:现在正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将和其它国家合作参加这一辩论,并将在其中保

持思想开放。自然,我们希望这样一种态度将成为辩论的特点,这就是开放思想并愿意达成一种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后果。

引起争论的是下列三个主要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去做?”。

我们只所以提出第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仍然是引起疑问的问题。非常明显,整个大会都广泛承认,必须改革安全理事会。早些时候,还有人附和这一论点:“如果它没有坏就不要去修它”。虽然这听起来很有民间风味和智慧,但事实上却是一种被误导的观点,因为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等到某些东西坏了的时候才采取行动。

澳大利亚并不是说安全理事会已经坏了,但是,我们和许多其它国家一样相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必须在安理会坏掉之前对其加以改变。安全理事会正在紧张状态之下,这在许多方面都得到显示。我在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从1948年到1987年,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通过了15项决议,而从1990年到现在,所通过的这类决议是58项。

我必须很明确地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从事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这将使我们能够着重处理主要问题而不是处理次要的问题。进行正确的工作并肯定我们有正确的理由来进行这项工作,两者都是没有任何做法来替代的。

在这方面,强调宪章第25条有不可降低的重要意义。该条在基本政治和法律方面意味着,由于安理会的决定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约束力,十分重要的是安理会的所有决定必须尽可能地得到所有会员国广泛的甚至是协商一致的支持,而不只是安理会的大多数成员国或者所有的或一些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按照宪章常任理事

国享有特别的权力,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义务和责任。

安理会的各项决定能够获得这种协商一致支持的关键办法是提高安理会的代表性。虽然《宪章》指定某些会员国作为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的其它理事国是由普遍性的机构大会选举的,鉴于这一理由以及《宪章》所载的其它理由,安全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大会的一个代表机构。此外,它对大会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有着明确规定的责任。

由于总的会员国数目有所增加,而安理会的成员数目28年来依然未变,安理会的代表性已经明显下降,很多人指出这种下降大于以数字比例衡量的下降。

还有人提出了其它许多论点作为改革——更确切地说是紧急改革——安理会的理由。但澳大利亚认为,改革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必须得到协商一致的支持并因此需要安理会的代表性恢复其与总的会员国数目的比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该作些什么?——显然将会有更多的不同意见并将有大量的辩论。澳大利亚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完全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关切:我们必须确保新的安理会具有效力。如果变革产生的情况将使新的安理会在履行其繁重的职责方面不如现有的安理会,为改革而进行的改革将是毫无意义的。

其成员数目增加至能确保比今天更好地代表普遍会员制的安理会才是有效力的。安理会成员数目的增加将考虑到《宪章》第23条所载的标准,或许应该特别铭记第三条标准即公平的地域分配。这种增加将有一个严格的数目限制范围,因为广泛的意见认为,超过了某些规模就极难想象安理会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完全是因为成员国超过25个左右的机构的固有动态的关系。其实,接近20个成员将更为有效。最后,这样也不会比现在更加难以作出决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

我们在澳大利亚对秘书长要求会员国表态所作出的答复中指出即使增加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也不应该扩大否决权。在这方面,我国的答复指出:

“改变安理会的组成必须同审查安理会的决策方面相联系,并结合这种方法加以审议,然后在扩大的安理会中采取这种方法”。(A/48/264,第9页第3(b)段)

澳大利亚对安理会为什么必须进行改革以及如何进行变革的态度,我采用的最好的总结办法莫过于再一次引用参议员埃文所著的“为和平而合作”一书,在该书中他指出:

“目前人们注意力日益集中在安理会的代表性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是否有效最终将取决于国际支持的程度,而安理会被认为能充分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并反映全球性和地区性权力现实的程度大小又将反过来影响这种国际支持。为了保持其合法性,安理会必须被人民认为管理全球性范围内的事并在形势需要的时候愿意重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和威胁,而不是按照安理会个别理事国的国家利益的意愿行事……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所处理的问题不但应该是代表性问题而且也应该是改革决策程序的需要问题。”

现在我要谈谈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实现这一改革?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有三个主要的答案:第一,我们必须设立一个大会所有会员国都能参加的工作小组,在该小组中我们可以充分并公开地讨论所有有关问题“成员组成、决策方式、效能和对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责任。

第二,我们必须努力而迅速地进行工作。应该在第四十八届会议结束时得到一份报告,使我们能在1995年

前进一步以期在联合国50周年时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这并不是一个武断的也肯定不是错误的最后期限。改革的需要是紧迫的。这是我们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的要求,而且不能指望在今后的年代里会减少这些要求。在1995年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可能意味着——可能意味着——新的安理会在该日期之后的两三年之前将不发挥作用,这是由于批准修改《宪章》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付担得起行动不够迅速的后果?我们认为是负担不起的。

第三,我们在发言中已经谈到的关于安理会的决定必须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我们改革安理会的决定本身也必须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协商一致意见必须成为工作小组内一切问题的惯例。

这些就是澳大利亚对我们认为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历史性工作——改革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独特的责任的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尚未决定的三个主要问题或问题类别的观点。

但是在我们审议安理会本身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两个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安理会与联合国其它机构特别是大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给什么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一事我们制订一种比以前所采用的更为严密的定义。

安理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缺乏足够的相互尊重的地步,这损害了联合国的效力。这种情况已导致两机构间传递情报不够,这自然也造成不必要和具有破坏性的不满情绪。这种局面同旧金山所设想和《宪章》所规定的两机构间关系是不一致的。

人们可以,而且必须找到改进两机构间磋商和传递情报的办法。两机构间的合作手段可以随时创立——比如安全理事会就维持和平、提供部队和预防冲突等

问题成立安理会非成员可以参加的委员会。

安理会还可以更加重视大会近年来就安理会向大会提交报告的性质、及时性和质量所表达——而且是特别强烈表达——的意见。安理会还可以作出更大的努力，认真考虑——而不是象征性地考虑——大会表达的观点。在这方面，不应过分谋求《宪章》第十二条的庇护。

就大会方面而言，有人已作出公正的评论，即如果大会的意见和要求今后得到更认真的考虑，它就会考虑更加注重实际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关切，以此来认真制定其立场——换言之，比过去更多地发挥合作促进和平的精神。当然两极统治世界政治的结束应该使大会更加容易采取这一立场。

所有这一切争论的基本概念，即对《宪章》赋予安全理事会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概念，是什么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宪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主权、国家完整和不可侵犯性，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包括联合国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角度来对此下定义的。

许多人已论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可以理解的是，冷战结束时所下的这个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对安全的军事威胁角度制定的。但是，当今世界和可预见的未来现实是，对不同于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但的确在许多情况下也包括国家——来说，这一明显的安全威胁要么是非军事性的，要么是一种非军事和军事威胁的混合物，而不是纯粹或典型的侵略，或完全基于军事的安全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安全理事会在1992年1月的首脑会议上曾把以下一段话列入其声明：

“单单国与国间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并不足以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除了军事以外，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等领域的不稳定因素

已构成对和平的威胁。”(S/23500,第3页)

澳大利亚同意并坚定地认为，我们今后必须确保在工作中逐渐给和平与安全和威胁规定更加明确的定义。然后我们将处理如此众多人民所面临的真正威胁，这将导致对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的注意力、精力和资源的投向作出重大调整。

就后者而言，我要指出，与此相关的是，《宪章》已预见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并在第65条中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创造性关系，但在冷战期间这种关系的潜力曾被人们所忽视。现在已经有人提议振兴这种关系。这些提议应予以采纳。

同样，我们还必须更加注重执行《宪章》第五十五条，该条承认经济及社会福利同

“创造国际间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

之间的积极联系。在第五十六条中我们大家都保证要实现第五十五条规定的宗旨——这的确是一项保证。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国政府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忽视了由联合国采取的预防性行动。我们这部分工作如果说事实上不是冷战最突出的受害者，那么也是其最明显的受害者。《宪章》系统的组成是，一个受权向安理会提出其看法、关切和建议的秘书长，由了解世界上发生的问题并对其十分敏感的各国组成的大会，和享有作出决定和调动资源这一独特权力的安全理事会。《宪章》规定的所有这些机构都应在问题和争端升级为武装冲突以前，广泛和积极地谋求确定这些问题和争端，尽早而不推迟地建议和着手采取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这些基于《宪章》的机构外，在此信息时代还必须要大幅度扩大基于媒介和技术的信息来源，而这些信息已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目前认识的问题，其认识程度是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的。

在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审查时,让我们确保它将有效地,并以具有代表性的方式从事其传统工作,并作出能赢得国际社会广泛共识的决定。但是,也让我们使它成为一个现代场所,一个处理从大多数人民的经历和我们现代及可预见世界的特点来看是真正的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概念的场所。让我们尽量使它有能力和指引它预防冲突,而不是被迫解决冲突。

最后,我重申我们正处在过渡时期,如果我们给世界提供一个适合当今和今后情况而非过去情况的安全理事会,我们就将迎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埃拉拉比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迅速和意义深远的事态发展是过去几年的特点。因此,我们现代世界的形式和实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给合作创造了机会,但也使联合国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使联合国更顺利地适应这些迅速的变化和日趋严峻的挑战,再次全面审查其各主要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应该毫不拖延地提出努力改进和改革的目标和实际办法。

安全理事会是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机构。因此,它应该是改革的首要目标。应当回顾,当安全理事会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立期间不活跃的时候,《宪章》的一项基本先决条件崩溃了,结果使整个联合国系统受挫。联合国是作为注重行动的一个组织,却在面临严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无能为力,有时甚至面对发动赤裸裸的战争的时候也袖手旁观。

今天的世界权力结构和国家之间行为的方式有利于联合国对各项发展做出积极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使我们面临着更加强大的安全理事会;也应当是全体联合国成员认真考虑的问题。

《宪章》确立了某些应当始终得到尊重的防止发

生偏差的机制和平衡。在我们当今世界里,将绝对主权的概念说成是不符合历史潮流是时髦做法。这种言论必然适用于所有方面。根据《宪章》第24条第1款的规定,安理会是代表全体成员行事的。因此安理会对会员国负责的,也是对大会负责的。安理会行使其广泛的和空前未有的权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必要的情况下,安理会可以接受国际法院的审查,以保证法治和正义的规则得到最高度的尊重。

大会开始了重新审查进程,并通过了第47/62号决议,该决议认识到国际局势的变化,也认识到有必要在联合国系统内继续振兴和重建的进程。根据上述决议所编写的秘书长的报告(A/48/264)明确地反映了会员国对重新审查、扩大和改革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努力表示压倒多数的支持。现在大家都广泛地同意有必要加强安全理事会的组成与工作方法的民主方面,而由于最近的事态明确地强调了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点就更为重要。

因此,埃及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公平代表性及成员的增加是改进和加强安理会履行其《宪章》所规定的责任的能力的总的努力中一项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的扩大是开始加强安理会进程的重要步骤。但是,这项工作不应当妨碍安理会工作的效力和效果,并应当反映新的权力平衡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区域强国作为主要国际活动角色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方面,必须适当地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当始终铭记安理会扩大和具有平衡的代表性一定会对各局势作出更敏感的反应并有更高的声誉。

因此,重新审查安理会组成情况是很适当的,其目的是要准确地反映联合国成员的增加,以及国际和区域权力结构的现实。为此目的,埃及在响应秘书长请各国政府提出建议的邀请时建议,

“为照顾到现代世界中最近出现的新发展情况,设立一类新的安理会成员,以反映当前的区域实际情况,应该是有益的。应当建立一个介于常任成员和非常任成员之间的成员组别。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能方式是在每区域建立一个或一个以上不具否决权的席位,由该区域的主要大国轮流担任。在这一方面,应按照《宪章》第23条的规定,适当顾到联合国会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联合国其他宗旨贡献,包括参加维护和平行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和承担日益重要的责任。”

我们认为,建立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以审议安全理事会的组成情况显然是走向正确方向的一个步骤。我们坚决认为,这个工作组应当考虑有关安全理事会职能所有事项。工作组方案应当包括安理会的惯例、方法与程序的全面审查,以及对其与大会及《宪章》所建立的其他主要机构的关系的全面审查,以便保证最有效、民主和透明决策进程。

代表所有地区的大量国家已经对这一项目的一项决议草案进行了谈判。我谨感谢新加坡和印度代表团令人钦佩地发挥了领导作用。决议草案的最后形式是做了认真平衡的一项折中。在明显地认识到不可能具体说明真正意图的时候,就采用了一般的模式。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决议草案正确地声称,工作组将注意达成普遍一致的重要意义。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同意,所有代表团都应当努力实现普遍一致意见。但是,这不应当被看作是对任何代表团或者一些代表团提供否决权来阻碍工作。还应当指出的是,实现普遍一致应当限于我们工作最后成果,而不应当适用于工作进程中的各个阶段。

我谨赞扬大会主席对这一事物采取的行动,并重申

我国代表团有意积极参加工作组的讨论,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在大会本届会议结束以前得到圆满结束,从而能使大会下届会议尽早地按照《宪章》第108条的规定开始批准《宪章》修正案所需的进程。

最后,我们的提议是,归根结底,原来的《宪章》的模式已经改变。《宪章》中的许多概念已经不切实际,因此已经被默默放弃了。新的趋势和概念出现了,并且经过逐渐演变得到了接受。以前广为宣传的联合国的缺点应当共同地得到处理,并且应当决定适当的措施,以保证更有效的体制。新形成的趋势和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应当为更有效和负责的联合国创造有利条件。

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联合国宪章》为安全理事会规定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确保联合国采取迅速和有效的行动。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享有尽可能最高的声誉。我国政府赞同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即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和联合国会员国数目的持续增加是我们有必要审查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大规模。

一些年来,这一问题在联合国内一直是越来越紧张的辩论的主题。1992年在印度倡议下通过的第47/62号决议要求秘书长请会员国提出对安全理事会成员组成进行可能审查的书面意见,从而成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内,75个会员国响应了秘书长关于提出意见的要求。大量答复及其内容充分证明有必要以综合方式处理这一问题。秘书长在1993年9月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摆在桌面上的若干提案值得认真研究”(A/48/1,第40段)。

在我非常简短的发言中谈到这一点时,我谨引证德国外交部长9月29日在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上的下列发言:

“今天,关于安全与和平的最重要决定是在安全理事会中作出的。这是《宪章》一开始的设想。任何希望和平的人都必须加强安全理事会。

“联邦政府在答复秘书长的请求时声明,对于安全理事会将来的组成来说,效率和可信性是同样重要的。

“德国还准备担负作为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责任。……然而,我们在审议改革安全理事会的问题时,只有在考虑到第三世界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时才能够保持并加强安理会的可信性。”(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正式记录,第十八次会议,中文本第17页)

为了找到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坚决赞同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工作组,同时保证建设性地参加该组的工作,以期加强整个联合国。我将在该组的审议中提出详细意见。

最后,我谨指出,我们认为,1995年本组织五十周年可以成为该工作组审议工作的方向。

布尔朱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过去几年里,国际关系的格局和实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建立一个新的和可取的国际秩序继续是我们时代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所处的重要历史关头要求我们进行反省和采取积极行动。国际社会不应当在变革中袖手旁观,而是必须下决心建立控制变革方向的充分的机制。

在此方面,焦点应当是安全理事会。今天,联合国的威信和可信性比以往更加取决于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冷战的结束使安理会能够摆脱政治限制,使其能够发挥大大增强的作用。新的国际环境要求对安全理事会采用新方法并重新检查其作用。为了使安全理事会

能够更加有效和高效率地履行其扩大了职责,应当加强安理会的道义权威。这要求安全理事会更能够代表和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现实。与此同时,应当审查其工作方式,以体现民主化的精神。因此,有关公平分配席位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的重视是非常及时的,并应当导致安理会的早日改组。

我们注意到包含75个成员国观点的秘书长的报告,很高兴地指出在下列四点上存在着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第一,安全理事会的有效性是重要的;但是,第二,安理会的可信性和道义权威也是重要的。第三,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应当增加。第四,应当审查安理会的工作方式,安理会的决策进程应当更加透明和民主。

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在透明度方面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安全理事会1993年6月30日通过的文件S/26015所规定的机制是对透明度作出的承诺,并且是在透明度进程中向前迈出的一步。然而,能够并应当做更多的事。

根据《宪章》第25条,会员国同意接受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这使安理会在联合国系统内处于独特地位。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权威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按照《宪章》第24条,安理会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行事。有鉴于此,安理会的决策进程极其重要,安理会的各项决定应附合全体成员的意见。

安理会的决议必须以一种充分的共识为基础,这也是《宪章》第1条第4款的文字和精神中固有的事实,该款将协调各国的行动列为联合国宗旨之一。因此,安理会行动的合法性最终取决于通过政治机制,而不是法律概念表达出来的共识的程度。因此,缺乏充分的协商机制损害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合法性。

就实际而言,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磋商制度,使一

般会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参加安理会的非正式磋商,正是出于这一原由,第七章行动次数的增加,以及就此而举行的极为有限的磋商,正在一般会员中引起极大的关注。既然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实行的制裁措施,那么,至少,受影响最重的那些国家应该能够充分参加决策进程。

不幸的是,安理会目前的工作方式严重依赖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及不公开的非正式磋商。应当为非理事国的利益,设计进一步的程序,使这一制度更加民主化。直接参与安全理事会审议的一项争端的所有各方,包括非理事国,都应该被邀请参加这些审议。同样,安全理事会应当更多地举行公开会议,让一般会员参加关于他们感兴趣的事项的辩论。

正如我国外交部长希克迈特·切廷先生9月30日在大会上发言时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坚信:

“扩大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将加强其有效性。”(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正式记录,第11次全体会议,第35页)

但是,不应把扩大仅仅看作是数目的增加,还应当设想设立一类新的席位,由有资格成为半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担任。安理会半常任理事国可由按照客观标准指定的特定数目的国家轮流担任,这些客观标准是:人口、代表性份量、地缘政治姿态、经济潜力、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记录,以及地域分配。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相当多的国家已在设立一种新的理事国席位和运用轮换原则方面,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我们还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代表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消除一个人口相当多的联合国会员国可能长时期内不担任安理会成员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同《宪章》的序言相矛盾,该序言的开头说:

“我联合国人民……”。

它也损害安理会的代表性份量。

安理会结构的民主化,将进一步鼓励联合国各会员国积极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并加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道德基础。否则的话,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将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建立一套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事实上,责任制的民主原则在《宪章》中无所不在;我们现在必须做的是,使有关各条款重起作用。在这方面,既然两极控制国际体制的状况现在已经过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关系值得重新考虑。

事实上,《宪章》第15条第1款指出,大会不仅应该“收”还且还应“审查”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年度及特别报告。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应该更加充实,以便为一般会员国彻底“审查”安理会的工作提供一个充分的基础。

对早日改组安全理事会的问题已有充分的创造性思考和广泛的要求。我们必须尽早开始工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以协商一致方式,建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工作组,负责安全理事会的改革。这一工作组应该以秘书长的报告为基础开始工作,该报告包括75个会员国的意见。该工作组的讨论应以效力、代表性、透明度、责任制、信誉、合法性和道德权威等相互关联的概念为指导。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加强所有这些概念。我们必须起而应付这一挑战。

比汶颂干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大会本届会议现在再次处理关于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议程项目。

这一问题正在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个恰当时刻引起

人们更大的注意。今天,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各会员国正在继续努力振兴和改组联合国,表明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最全面的多边论坛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冷战后时代,要求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创始者希望它成为的组织已经越来越有意义和必要,在世界显然需要集体主义和决心的时刻,这一要求成了各国关心的紧迫问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的需要,事实上已使联合国成为把国际社会的集体意愿变为实际结果的主要机制,虽然成功的程度每次不同。

《宪章》授权在这些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但是,人们越来越感到,联合国一般会员国希望看到联合国更加平衡,其成员更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在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最重要机构内。

会员国对去年有关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的问题的第47/63号决议的反应,充分说明大会成员继续希望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决策进程有所改变。

我国代表团正是抱着同样的关切和改革的愿望,参加这场辩论。我们认为,对话是任何改革进程中的第一步。在冷战后的环境下,分担共同的关切和避免冲突,或许是改进联合国的最佳途径。

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已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是,自1945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大体保持原样。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大会授予安全理事会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代表大会采取行动。因此,理应征求大会的意见。我们不谋求超越《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大会的职权。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时代要求我们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审查。更为重要的是,公平代表权问题应是这一审查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安全理事会上一次扩大是1963年。当时的理论基础是联合国会员国数目已有很大的增加,从1954年的51个会员国增加到1963年的113个。现在,30年过去了,会员国数目达184个。国际体系和力量的组合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新会员国数目的增加是考虑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问题各个方面的有效基础。在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审查与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法有关的问题和与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有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认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进程。那么,我们更迫切需要尽快迈出第一步。

我国代表团坚信,这一审查应基于《宪章》第二十三条阐述的原则。我们还愿意考虑增加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以及其他类型的理事国席位。秘书长的报告(A/48/264和Add.1-4)为这一审议提供了有益和宝贵的背景资料。各国政府向秘书长提出的意见也对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的审议极为重要。

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是其工作方法的有效运作和透明度。虽然世界上各种冲突引起急事有必要使安全理事会立即迅速地行使其职责,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有效地代替以全体会员国的广泛支持为基础的透明和民主进程。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必须是而且必须被人们视为公开作出的,以便使这些决定获得使其发挥有效作用所必需的广泛支持。一个有助于加强交流和提高对安理会的决定的理解的很小但有效的方法可能是,设立一种以一名发言人为纽带的联系——可能可以根据第十二条第2项的规定设立这一机制——或者也许可以与区域集团保持经常接触。

这些问题紧密相联,并且与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完全相关:安全理事会与全体会员国及大会之间的关系。随着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的交流得到改

善,还有可能因此出现一种更为良好的关系。

虽然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各会员国只要有政治意愿进行合作并一起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今后我们能做得更好。当然,到1995年联合国五十周年时,我们应已经充分实施现在我们寻求进行

的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为实现这些目标,泰国代表团愿积极参与和充分支持我们现在在大会全会这一重要项目下进行的事业。

下午1时10分散会
